

孙延钊与温州地方史研究

廖章荣

提 要：自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孙延钊着手整理祖父、父亲著述，并兼及乡邦文献的整理，此后长期致力于温州地方史的研究。表彰乡贤是孙延钊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他主要通过为乡贤撰写年谱以及立传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表彰。此外，孙氏对永嘉学派的研究亦有表彰乡贤之意。抗日战争时期，孙延钊在研究温州地方史时极力表彰温州先民的反侵略斗争，这是他感怀时局的真情流露，而孙氏亦有意借此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

关键词：孙延钊 温州地方史 乡邦文献 乡贤 民族意识

孙延钊（1893—1983），字孟晋，号勘庵，浙江温州瑞安人，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之子。孙延钊毕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曾在北洋政府任职，此后历任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孙延钊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他从事温州地方史研究受祖父孙衣言、父亲孙诒让的影响颇深。自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孙延钊着手整理乡邦文献，并逐渐扩展到温州地方史的研究，由此成为浙江地方史研究的早期学者之一。但迄今为止，孙延钊的地方史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①这与孙氏所取得的成就显然不匹配。因此，对孙延钊的温州地方史研究进行专题讨论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旨在对民国时期孙延钊的温州地方史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梳理孙氏的地方史研究，对明晰温州地方史乃至浙江地方史研究的早期状况或有所裨益。

一 整理乡邦文献

温州瑞安孙氏家族从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开始，即热心于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孙衣言、孙锵鸣均系道光年间进士，仕宦之余，孙氏兄弟长期从事温州文献搜辑，孙衣言编有《瓯海轶闻》《永嘉集内外编》、“永嘉丛书”等，孙锵鸣则有《东瓯大事记》等书。后来孙诒让从事乡邦文献的搜辑、整理，即与孙衣言、孙锵鸣兄弟的影响密不可分。孙诒让在父辈影响下，青年时代即对乡邦文献颇为留心。同治八年（1869）夏，孙诒让开始编撰《温州经籍志》^②，孙诒让编撰此书时得到乃父孙衣言的指导，今温州图书馆所藏《温州经籍志》稿本，就有不少孙衣言的批校语。^③同治、光绪年间，孙诒让多次公开征集乡贤遗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光绪三年（1877）发布的《征访温州遗书约》，孙诒让在文中说：

吾乡文献，二百年来散佚殆尽。无论宋元旧籍，百不存一；即前明及国初诸老所著，

① 据笔者所见，目前仅周立人对孙延钊乡邦文献的整理有所提及，惜未深论。可参见周立人：《孙延钊与温州乡邦文献》，《温州日报》2006 年 7 月 18 日，第 9 版。

② 参见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第 90 页。

③ 参见洪振宇：《“温州学”研究的先驱——纪念孙衣言先生诞辰 200 周年》，《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 年第 4 期。

亦大半无传。其幸存者，多系旧槧秘抄，单本孤行，最易湮坠。更数百载，恐益无从采辑，甚可惜也。兹欲广为搜罗，以钩沉补逸。凡遇先哲著述，片纸只字，罔不收拾。诸家倘有储藏，不论时代远近，卷帙多寡，均祈惠示，俾得抄存复本，甄其精要，校梓以广流传。^①

由此可见，孙诒让征集先哲著述并不以时代远近和卷帙多寡为限，这对于温州地方文献的保存显然具有积极作用。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孙氏玉海楼筑成，楼中所藏温州地方文献甚多。孙延钊说：“太仆公（即孙衣言——引者注）内伤乡学之衰熄，而思所以扶微起坠，外睹当时天下，汉学、宋学门户之论哗然，以谓永嘉经制兼综二者之长，可用以讲贯而疏通之。又当涂夏斡作《述朱质疑》，于永嘉之学，颇致偏诋。公尤不以为然，因广征永嘉先儒遗书，选刻行之。于是篇帙之散者复聚，学说之晦者重明，玉海一楼，遂为岐海文献之总萃。”^② 据此来看，孙氏建玉海楼的初衷在于贮藏征集而来的永嘉文献。孙延钊从事温州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受家学影响甚大，孙氏说“延钊忝生文献故家，而蚤岁藐孤，祖、父训诰”^③，即是明证。

孙延钊着手整理乡邦文献当始于1927年校勘乃父孙诒让遗著《温州经籍志》。孙诒让完成《温州经籍志》初稿后，曾于光绪三年再易其稿，此后再未进行修改，“稿本辍置篋衍垂卅载”。民国年间，浙江省图书馆曾将此书刊印，但因错讹较多而为读者所诟病。鉴于此，孙延钊决定对《温州经籍志》进行全面整理及校勘，他在《〈温州经籍志〉校勘记》中说：“民国丁卯，延钊自燕京归，检点初、再各稿，谋别镌之于家，而里中梓人寥落，难于集事，乃有意先事整理。”^④ 1928年，孙延钊开始“采辑《温州经籍志》中所未著录之书，至清末止，续编为《温州经籍后志》”^⑤。1929年，孙延钊完成孙诒让遗稿《籀庠述林》的整理工作，孙氏所撰《〈籀庠述林〉跋》对此书的整理过程有详细说明。1930年，孙延钊又将未编入《籀庠述林》的遗文另编为《经微室遗集》8卷，他编此书时得到从侄孙师觉之助。^⑥ 孙延钊完成《孙逊学公年谱》的编撰后，拟对乃祖孙衣言之文进行编目，“乃悉检家藏公所为古文初稿，撮取原目”，按年排比，编成《逊学斋文目编年录》1卷。^⑦ 与此同时，孙延钊又对孙衣言之诗进行编目，“以年为纲，排比先后”，编成《逊学斋诗目编年录》^⑧。此外，孙延钊在研讨乡邦掌故时，还对孙衣言所编《瓯海轶闻》进行了校勘，并撰有《〈瓯海轶闻〉校勘记》。

孙延钊在整理先人著述的同时，对温州乡贤著述的整理也颇为重视。1935年，孙延钊将玉海楼所藏温州乡贤著作编成目录，并附外编，又“录外地人著述有关温州文献者写成一轶，送《浙江省立图书馆刊》第4卷第2期上发表，同时抽印单行本出版”，孙延钊编写的这份目录，

① 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160—161页。

② 孙延钊：《浙学中之永嘉宗派》，《国风》第8卷第9、10期合刊，1936年，第31—32页。

③ 周立人：《孙延钊与温州乡邦文献》，《温州日报》2006年7月18日，第9版。

④ 孙延钊：《〈温州经籍志〉校勘记》，《瓯风杂志》1934年第1期。

⑤ 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366页。

⑥ 参见孙延钊：《〈经微室遗集〉跋》，《瓯风杂志》1934年第4期。

⑦ 参见孙延钊：《〈逊学斋文目编年录〉跋》，《瓯风杂志》1934年第5期。

⑧ 参见孙延钊：《〈逊学斋诗目编年录〉跋》，《瓯风杂志》1934年第6期。

仅明清两代刊本、稿本、抄本就达 462 种之多,可见玉海楼所藏温州文献之富。^① 20 世纪 30 年代初,孙延钊编《孙敬轩先生年谱》时,极力搜辑孙希旦著述,除玉海楼所藏的孙氏遗稿外,孙延钊又从其他书中获睹了部分孙希旦的佚文,孙延钊“拾其缺者异者,而去其重复”,编为《求放心斋遗诗》一册,收入孙氏遗诗 163 首,其中 134 首以《敬轩诗存》为名刊行于世。^② 这一时期,孙延钊还参与了温州乡贤遗著的征集活动,他在《明季温州抗清事纂》中说:“乙亥、丙子间,郡中有征辑乡哲遗著之会,余以三五同志共预其役。”^③ 此次文献征集活动实际是为响应浙江省教育厅的号召而发起。浙江省教育厅“为阐扬本省文献,推进本省教育学术起见”,准备举行全省文献展览会,并向全省各地公开征集书籍、书画、古器物、金石拓片、图片、民族革命文献等六类藏品。由于征集范围广泛,名目繁多,且藏品散处各地,于是设计委员会决定采取设立征品分会的办法,温州征品分会即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孙延钊是温州征品分会的副主任,他在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说:

(浙江省)教育厅所发表之缘起中,有“南北两宋,理学蔚兴,鄞婺永嘉,各派蜂起”等语,可见我永嘉故郡,在中国文献史上,地望本甚隆重,不但为浙省之一名区而已。大概我温州在两汉三国时代,荆榛肇辟,几于无文献可言。至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创置永嘉郡,于是文献始渐见曙光。下逮赵宋,学术人才,乃称极盛,其文物经千年而流传至于今日者,如书籍、金石等等,尚未尽佚。更历明清,日积月累,灿然大备。故凡今日生长其间,或官居斯土者,对于具有地方特性之先代人文,皆应共起而表章阐述之,此固桑梓义务,责有所归。^④

鉴于此,孙延钊提出“广征”与“精选”两点意见,所谓“广征”即广泛向私人征集文献,所谓“精选”即应特别注意征集罕见或具有特殊价值的文献,并须对文献的真伪进行鉴别。

二 表彰乡贤

孙延钊在搜辑、整理乡邦文献的同时,对温州乡贤充满了敬意,表彰乡贤成为孙氏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章太炎《孙逊学先生年谱序》云:“宋世永嘉诸贤,与新安、金溪、金华并峙。其后三家皆有传人,讫元、明未替,而永嘉黯然不彰……逊学父子生七百年后,独相继表彰之,专著则有《永嘉丛书》之刻,佚篇则有《永嘉集》之纂,括囊大义,辨秩源流,则拾南雷、谢山之遗,以成《永嘉学案》二十卷,最录凡目,则《温州经籍志》为一郡艺文渊海,自是郑、薛、陈、叶与先后作者之遗绪,斩而复续,呜呼盛矣!”^⑤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对乡贤的表彰在无形中对孙延钊产生了影响。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孙延钊通过为乡贤撰写年谱及立传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表彰。1934—

① 参见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 367 页。

② 参见孙延钊:《写本〈求放心斋遗诗〉跋》,《蓼绶年刊》1937 年创刊号。

③ 孙延钊:《明季温州抗清事纂》,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

④ 孙延钊:《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温州征品分会成立陈辞》,《蓼绶年刊》1937 年创刊号。

⑤ 章太炎:《孙逊学先生年谱序》,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第 1 页。

1935年,孙延钊所撰《孙敬轩先生年谱》连载于《瓯风杂志》。敬轩即孙希旦之号,孙希旦系温州一代名儒,其事迹颇有称道之处。孙延钊先是在年谱中对孙希旦的功名、学行进行表彰,继而对年谱的撰述缘起及过程作了交代。《孙敬轩先生年谱序》云:

有清三百年间,吾瑞往哲以甲榜入词林者七八人,甲鼎及第则我家敬轩先生一人而已。虽然,如先生者岂徒以场屋功名、当时科举之士所矜尚而推挹者为己重乎?盖先生学术行谊卓然通儒,其经业足与济阳张氏、婺源江氏相上下,开乾嘉义疏治涂之先;而函道艺,该体用,则远绍永嘉先辈郑文肃、薛文宪之绪遗;先生之所以命世,斯为宏矣。向使天假之年,施竟厥志,所成就不更伟哉!先生既歿,遗著晚出,自项氏雁湖、幾山两先生搜讨于前,先祖太仆公、先叔祖侍郎公、先考征君公相继表章于后,瑰笈玮稿,梨枣俶传,版藏余家诒善祠堂,今世所行《永嘉丛书本》也。延钊窃读《书》《礼》二解,稍稍穷绪论之大凡。及检玉海楼庋阁,得先生诗文残帙数小册,则深惜《求放心斋全集》莫可复睹。间复旁涉他籍,推迹其生平,乃会最编次,草为《年谱》。属稿之初,颇虞见闻寡漏,考索不备。然数载于兹,所续得而茜补者盖亦廛矣。^①

孙延钊盛赞孙希旦为一代通儒,其经业“开乾嘉义疏治涂之先”,行文中所流露的溢美及崇敬之词显而易见。事实上,孙延钊在编辑孙希旦遗诗编《求放心斋遗诗》时,已有表彰孙氏之意,《写本〈求放心斋遗诗〉跋》云:“先祖太仆公尝为先生(指孙希旦)《行状》,谓著有《求放心斋诗文集》,先征君据以编录其目于《温州经籍志》,因辄用‘求放心斋遗诗’六字题此册端,盖两世表章先生之遗意,窃所追慕,而冀仰承于百一耳。”

孙延钊编撰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时,“因览记之便,述及黄氏”,于是又编撰了《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瑞安“五黄”系指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5人。瑞安黄氏在当地素有声望,与孙氏家族渊源颇深。孙延钊云:“白岩安福宦黄氏,当中晚清间以文学传家,蔚为时望,遂在政治、教育立业宣猷,与吾家诸先达结师友,缔婚姻,互以道义相切镌,以志节相矜尚,国人征浙江黎献,每并称瑞安孙、黄,良有以也。”^②“五黄”的行谊、文章、交游是孙延钊表彰的重点,他编撰年谱时对相关资料亦颇为重视,孙氏《书〈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后》云:“兹就斯编大概观之,中若关于诸先生之科名仕履,性格行谊,与其匡时之学术,寿世之文章,师友交情之渊源,诗酒联欢之踪迹,有见必录,细大弗捐,而旁摭寿庆与哀挽诸作,其有情文俱至,或辞句可诵,抑或附加注语足供参证者,亦多移写而悉假之,是以牖列排比,虽知间有芜累,然终未肯删芟。”

孙延钊对乡贤的表彰还体现在他对永嘉学派的研究,孙氏此点亦受孙衣言、孙诒让影响甚大。孙衣言编《瓯海佚闻》时以《永嘉学术》21卷为甲集,卷端自叙云:“学术者,乡邦之大事也,一州一邑人心之邪正,风俗之厚薄,人才之众寡,莫不于学术见之。”又云:“余之为此,岂徒一州一邑之事而已哉!”由此可见,孙衣言编《永嘉学术》的目的并不仅在于记一州一邑之

① 孙延钊:《孙敬轩先生年谱》,周立人、徐和雍编:《孙延钊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② 孙延钊:《书〈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后》,周立人、徐和雍编:《孙延钊集》,第356—357页。

事,而是试图通过表彰永嘉学术来阐述“人心之邪正”“风俗之厚薄”“人才之众寡”,后来孙诒让编撰《温州经籍志》时即秉承了乃父这一宗旨。从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孙延钊开始研究永嘉学派当始于20世纪30年代校勘祖父和父亲的著作。他在《浙学中之永嘉宗派》一文说:“延钊比岁家居,稍尝研讨乡邦掌故,辄以校刊是书(指《瓯海佚闻》),及复勘浙刻本先徵君遗著《温州经籍志》,为日常自课,偶涉他籍,间亦别有所获,每随笔附增之……会特刊征文相及,谨就诵习先作所得,而略仿四明万氏书例,述为永嘉学者宗派一文以应之。”^①此文所列宋、元、明三代的永嘉学人,“大抵学术行谊,粹然师儒”,而所列清初至嘉庆、道光间的温州学人,均以经术而著名。不久,孙延钊又撰《浙江永嘉学派之源流》一文,对永嘉学派的源流作了详细的探讨。此外,孙延钊还撰有《永嘉学谱》《永嘉学艺丛编》《宋永嘉学者年表》《宋代思潮中之永嘉学风》等论著,从不同方面对永嘉学派进行研究。孙延钊认为永嘉学风具有喜博务精、公平批判、实事求是、注重史地、善为文辞5个特点,他在《宋代思潮中之永嘉学风》一文中特地敬告当代青年学人要注意以上几点,“冀其引以自觉觉人,交相淬勉”^②。孙延钊研究永嘉学派,除弘扬和表彰永嘉学术外,还有意将永嘉学人作为当时青年学子的楷模,他在《浙学中之永嘉宗派》说:“凡此永嘉儒行,正今日青年学子所当奉为楷适,而浙人言浙,则乡献典型所在,尤宜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欤!”^③孙延钊这种思想显然是与孙衣言、孙诒让的“经世之学”一脉相承。

三 激发国人民族意识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中国人投靠日本,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在这种情况下,表彰明末遗民气节以及抗清活动成为学界一时之风气,并产生了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论著,孙延钊编撰的《明季温州抗清事纂》《明代温州倭寇编年》即成书于抗日战争时期。

《明季温州抗清事纂》,不分卷,全书分为小引、史事拾录、忠烈汇传、遗老汇传、遗民汇传、诗文辑览6个部分。此书编撰年份不详,不过据书中小引称:“乙亥、丙子间,郡中有征辑乡哲遗著之会,余以三五同志共预其役,则睹如《叶天章遗集》《林任先年谱》各种抄帙,亦有可资明季乡闻探讨之助。乃检家藏桑梓群籍,更相稽核,甄综迩年耳目所及,杂缀成编,庶几补苴史志,稍章晦逸,而温州先哲之民族意识与精神,于以概见焉。”^④文中提到的乙亥、丙子分别指1935年、1936年,“迩年”即近年,可知此书当编撰于抗日战争时期。孙延钊在书中写道:“(明季)汉帜四树,各图匡复,弗畏险艰。所惜不能杜闾墙之内嫌,以和衷协力,御方张之外敌,卒致人谋未臧,先后归于倾覆。然一时忠贞壮烈之气,充塞苍冥,蟠郁于黎庶之胸宇,积岁月而不散。及其终也,或志决身坚,百计求死之得所;或隐沦岩野,孤踪希抗乎夷齐。其事其人,盖视前代为特盛者,不尤我民族史上之奇光欤?”^⑤从中不难看出,孙氏对明朝之亡似有惋惜之意,对明末遗民“百计求死”及“隐沦岩野”的精神则怀有无限之敬意。抗日战争时期的

① 孙延钊:《浙学中之永嘉宗派》,《国风》第8卷第9、10期合刊,1936年,第15页。

② 孙延钊:《宋代思潮中之永嘉学风》,《战时中学生》第1卷第3期,1939年,第48页。

③ 孙延钊:《浙学中之永嘉宗派》,《国风》第8卷第9、10期合刊,1936年,第32页。

④ 孙延钊:《明季温州抗清事纂》,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⑤ 孙延钊:《明季温州抗清事纂》,陈光熙编:《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第2页。

情形与明季有相似之处，即同样遭到异族的入侵。由古思今，孙延钊编撰该书的目实际已不仅在于“补苴史志”，还试图通过表彰明末温州遗民的气节以及民众的抗清活动来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并借此引起国人的共鸣。

《明代温州倭寇编年》作于1938年，全书分4卷，记事起于明洪武二年（1369），迄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关于此书的内容，孙延钊在“例言”中说：“本书所载史实，包涵寇踪之出没，近海贼巢之转徙，地方戎务之张弛，国防建设之前后，官民抗战之成败；而一代政令、军制之因革，当时将帅武职之进退，亦旁摭其有关系者列举之，以概见其大势。”^①关于此书的撰述目的，孙延钊在《明代温州倭寇编年·自叙》中说：“余生斯世，又遭彼族（指日本——引者注）狺狺之日，抚今追昔，触绪增喟。盖自去岁抗战以来，全国各地所遭之兵祸，视嘉靖遗事，其惨烈且尤过之，然吾人果能追效先民勇敢不挠之基本精神，更益以团结坚持之群众心力，前仆后继，诸无却顾，则丑类之歼，指顾可待，当不致有如明时受害之长久也。爰纂斯编，以便观览，以资兴感。举凡当日地方军政百僚之忧勤与庶民万众之齐心而奋厉，庶于是乎参互觐之。”^②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中国横行无忌，容易令人想起明代嘉靖时期的抗倭斗争，故孙延钊自称纂辑此书是“以便观览，以资兴感”。事实上，揣度孙氏之用意，其目的并不限于此，《明代温州倭寇编年》揭露了大量明代倭寇侵扰温州的事实以及当地军民的抗倭活动，这与抗战时期的情形也有相似之处。孙延钊纂辑此书是希望国人能“追效先民勇敢不挠之基本精神”，团结一致，共御外辱，这应该是孙氏作此书的另一用意。

概而言之，《明季温州抗清事纂》和《明代温州倭寇编年》都是孙延钊在抗日战争特殊情形下的产物，它们的编撰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两书的内容虽不相同，但却寄寓了孙氏这一时期的思想情感。结合书中内容和时代背景的分析，不难看出两书的主旨均在于表彰温州先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他也有意借此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从而达到服务于抗战的目的。

结 语

从孙延钊已刊著述来看，他从事温州地方史研究主要集中于1927—1945年，其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孙延钊除整理、搜集乡邦文献外，主要通过撰写年谱或立传的方式对乡贤的学行进行表彰；二是1937—1945年，孙延钊有感于日本侵华，将温州先民的抗倭、抗清活动作为地方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以期服务于现实。纵观孙延钊的温州地方史研究，他从始至终均受祖父孙衣言、父亲孙诒让的影响，但他并不完全受限于家学的影响，而是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赋予地方史研究新的内涵。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孙延钊：《明代温州倭寇编年》，周立人、徐和雍编：《孙延钊集》，第5页。

② 孙延钊：《明代温州倭寇编年》，周立人、徐和雍编：《孙延钊集》，第3—4页。